

墨子和平思想与康德“永久和平论”比较研究

夏 萌

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学界从未停止过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争讨。然而，针对和平问题的研究多限于国际政治关系领域，从哲学层面入手的探讨则较为缺乏。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都曾对此问题阐述一二，而西方近代哲学家对和平概念和实现和平方式等方面的论题也多有论述。因此，文章大胆地就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和西方近代哲学家康德的和平思想进行比较，力图归纳二者的同与异，并寻找其和平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关键词：墨子；兼爱；康德；永久和平论

作者简介：夏萌，女，助教，文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3-0071-04

一、墨子的和平思想

（一）“非攻”——反侵略战争的立场

墨子认为妨碍和平实现的主要障碍来自“攻伐”，即侵略战争。他从下面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墨子从“利”的角度批判了战争的危害。墨子认为“义，利也。”（《兼爱中》）从“百姓之利”出发，也就是维护了最大的“义”。所谓“百姓之利”，不在于一家、一集团、一国之私利，而在于公利，可理解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对战争的后果，他首先指出战争对农业活动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瘫痪将引起社会的混乱：“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老者不得息”（《非乐上》）；其次，战争造成的人员损伤会导致劳动力不足，军费支出被转嫁到农民的租税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激起的反抗此起彼伏，战争永无休止。

第二，墨子提出“察类”和“知类”来判定“不义之战”。为了一己、一国之利而损害别人利益即“亏人自利”，发起战争攻占别国是为不义。此外，墨子还列举了各种不义的同类。所谓“察类”，指的就是把握两者是同类还是不同类。通过“察类”，墨子将战争分为“攻”和“诛”。攻击无罪的是攻，攻击有罪的是诛，即判定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根本标准。墨子虽反对战争，但绝不反对正义的防御战争。

在反侵略战争的实践方面，为达到“非攻”的目的，墨子身体力行，率弟子奔波于齐、鲁、宋、楚、卫等国，成功制止了多次战争。

（二）“兼爱”——实现和平的终极理念

墨子认为“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因此，“兼相爱”应代替“交相恶”作为治国之本。墨子的“兼爱”理念是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的普遍平等的“相爱”，是互助互利的“和爱”。这一理想建立在墨子“人类同体、群我一体”的基点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天”面前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皆平等。墨子淡化了人类在经济、政治、宗教与文化等方面之间的差异，强调从人类共同的自然本性出发去塑造人类社会和平的客观基础。“兼爱”不解释任何道德上的意义，而是提出解决乱世乱象的办法。它不受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对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爱。

墨子提出的另一重要主张为“交相利”。“交相利”的目标为利民,而不是成就个人的利益。在墨家看来,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一切行动判断的依据都应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利益上去考虑。人们过于自爱、自利,不懂得“交相利”,必然造成冲突和混乱。

(三)“政长”——实现和平的政治手段

墨子认为,造成战乱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国家缺少统一的政治权威、共同的人类标准和一致的思想意志标准,因此必须建立权威的政治机构:“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他的所谓“政长”即“一方的行政长官”,意义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通过古代的民主程序从“天下”“选择”出来;二是其必为“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这一朴素的民主理想尽管在当时难以施行,但对后世政治制度的改良仍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四)“论辩”——达成和平共识的途径

墨家认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这都是当时名辩思潮论争中的问题。墨子认为自己赞同的论点,不要求别人也去坚持;自己不赞同的论点,也不要求别人去反对。墨家论辩的原则与现代和平对话的原则实际上是吻合的:在各种磋商和谈判中,双方对话的首要条件是承认对方人格的平等;会谈调解人应处于价值中立;双方应晓以大义,以理解、协商取代敌视和算计。墨子正是善于利用论辩去化解人与人、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猜疑和矛盾,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来实现持久和平的。

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契约为出发点,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群体彼此间的冲突和争执。其核心观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所有国家必须实行共和制。在共和制国家,人民的自然权利受到保证,此为建立国际联盟的基础。是否发动战争由全体公民而非贵胥政要决定,因此,考虑到战争带来的损失和伤害,公民支持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民主国家结盟是保证各国在国际上权利的最佳方式。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和平联盟强于一纸协议,因为前者旨在永久地杜绝战争,而后者只为结束一场战争。

第三,全世界公民对彼此的友好和善是形成和平联盟的前提,这意味着公民在离开祖国后不会遭遇敌视和欺侮。

那么,如何理解这三大核心观点呢?

首先,共和制建立在“自由”、“平等”以及“所有人依赖法律”三条原则上,具有和平的天性。如果由全体国民决定是否进行战争,他们必定深思熟虑,因为他们要自己作战、自己出钱,自己承受创伤。在此情况下,公民对战争会较为审慎,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战争的爆发。尤其在西方商业精神支配政治社会体制的传统中,理性的主导和自利的倾向必将引导世界人民走向和平。

其次,康德提出“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认为不同国度的人们应彼此相容,维护“访问权利”:“这种权利人人都有,即共同占有地球表面的权力……没有人比别人拥有更多权利在地球的某个地方生存”。这一陈述说明了康德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根本立场。此外,康德提出在“自然状态”下国与国之间趋向纷争,民主联盟制度可帮助各国获得“理性的自由”,进入长久的和平状态。

最后,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康德承认二者确有矛盾,但政治必须与道德结合,在道德愿景下,

政治中的“权利”之说才有现实意义，“永久和平”才能成为可实现的目的。人类社会朝着道德改善前进，强权暴力行为减少，遵守法律的意识强化，在共同体（民主联盟）内部会产生更多良好的行为，终将扩展到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改善，直至走向世界公民社会，实现共存共荣。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一战后启发了理想主义及和平民主论的诞生，自由理想者继承康德的衣钵，主张建立国际机构，通过国际合作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全球法制限制国家行为。在他们看来，人性本善；通过理性和道德，人们可互相帮助和合作；政府应改革政治制度，实现民主和自治，从而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席卷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理想主义的破产，但此后理想主义仍以多种形式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墨子和平思想和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同与异

（一）两种和平思想的契合之处

首先，墨子和康德的和平理论皆在“平等”前提下方能成立。墨子的“兼爱说”强调上天兼爱，没有偏私，一视同仁，因此才能从“爱己”推及“爱他”。同样，国与国之间也无强弱卑贱之分，各国应相互尊重，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话，才能和平共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将国家的共和制作为争取和平的先决条件，而共和制要求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实现自由、平等和独立，在保证最普遍的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大同。

其次，墨子和康德都将“大爱”作为和平的终极理念。“兼爱”是墨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兼爱中》）而康德也认为，世界公民权利应以各国公民的普遍友爱为条件，公民踏出国门后无论身处何地都不会遭受敌视，都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唯有如此各国才能携手建立和平联盟，才能永久地避免战争。这实际上也符合西方世界传统的“博爱”观。

再次，墨子和康德都重视“利”在推动和平实现中的作用。他们所谓的“利”均为“公利”而非“私利”。墨子认为义就是利，不义就是害，阐明了“义”与“利”之间的因果关系。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必然推动和平的发展。如果不能保证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公平的利益，和平也就无从实现。换句话说，任何单方面的和平都是不能成立的。可见墨家的和平理念及其实践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同时，墨子主张利害首先取决于人的感情，区分利害不应从个人而应从社会共同体的层面来看。使别人欢乐的就是利，使别人憎恶的就是害。可见利害不以个人喜好来决定，而是依据社会实际效果来决定，总而言之，社会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更优先。“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大取》）对整体有利的情况下，其中一点小的害处则不视为害；对整体有害的情况下，其中一点点利处则不视为利。所以，墨家的和平理念更注重集团的共同利益。

对康德来说，共和体制是完美的、符合人类权利的唯一体制。同时，由于各民族世代进行商业往来，通过人类自利的倾向，商业精神将支配每一个民族，促使各民族友好往来。康德认为利用人类自然的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永久和平终将实现——大自然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机制就是如此。另外，康德的权利概念可阐释为每个人的意志选择之自由与任何他人的自由能够相互共存的全部条件。他提出了一个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1]比如说，反抗暴君是正义的，但是以公开的反叛来实现自己被伤害的权利却是不正义的。通过这一原则，康德论证了国际权利领域中存在公共的权利状态，这种公共权利可作为缔结和平联盟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因为每个个体都要求在同一法律体制之下按照自由的原则生活，所以就要求公

民社会形成整体的共同意志去实现一种权利体制。这就论证了国家权利、国际权利与世界公民权利存在的合理性,为建立国际和平联盟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两种和平思想的相异之处

康德“永久和平论”的第一项正式条款就是:“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对此康德解释说:“由一个民族全部合法的立法所必须依据的原始契约的观念而得出的唯一体制就是共和制。”^[2]康德赋予共和制以唯一的“和平保卫者”的地位,并且是国家间联盟的基础。共和制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康德的和平思想中包含了对民主的推崇。

墨子则较为强调统一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即所谓“政长”制。他认为为人民谋,“君权应大于民权”,却忽视了国民的思想权利。墨子提出“逐级尚同”的政治模式。按照《尚同中》的说法,就是先由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一同其里之义),然后,由里长率领村民“尚同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然后率领乡民“尚同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然后率领国民“尚同乎天子”。村民意见分歧,里长统一不了,乡长说了算(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民意见分歧,乡长统一不了,国君说了算(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民意见分歧,国君统一不了,天子说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因此,“逐级尚同”的结果就是“集权制”。由此可见,墨子的和平思想认为,国家的集权乃是一国建立和平局面的体制保证。

墨子生活在封建体制兴起的战国时期,而康德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西方民主思想走进现代政治体制的关键阶段,历史视野的局限性和对所处时代思潮的认同性决定了二者和平思想的巨大差异。

四、结 论

通过对墨子和平思想和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讨论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相隔千年,二者的和平思想却具有惊人的契合之处,这反映了人类反战促和的观念从未消逝且不断进步,东西方关于和平的理念、实现基础和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实现长久和平绝非痴人说梦。根据上述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国际关系处理中,缔结和平联盟不失为良策,但必须认识到平等、民主和相互谅解才是发挥联盟作用的最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国家间应加强贸易联系,逐步取消贸易壁垒,建立更加紧密和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这对避免战争、促进和平无疑会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各个国家在国民教育方面,应让国民树立超越民族、种族和国籍的“博爱”观,培养国民“世界公民”和“公共权利”的意识,这无论对公民个体发展还是国家间友好关系都将益处良多。

参考文献:

- [1]〔德〕康德.历史理论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7.
- [2]〔德〕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85.